

西周王畿多元人群互动交融的考古学观察

王 一 凡

摘 要：西周王畿既是王朝核心政治区域，也是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多元人群交融共生格局的形成，根源于周相较商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特质。这一特质贯穿西周兴衰，自先周时期与戎狄的初步互动中萌芽，到商周之际灭商战争中的强力整合，再到西周早期分封制下的迁徙共处，直至西周晚期深度交融，其始终是周人崛起与兴盛的核心动力。纵观王畿多元人群，从都城看，呈现出“以都为聚，四方攸同”的特点；从各层级聚落和空间格局上看，呈现出“友邦冢君，保我有周”的态势；从多元人群的整体构成上看，呈现出“东南西北，无思不服”的气魄。周人“怀柔兼容”的特性，将文化差异在互动交融中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关键词：西周王畿 多元人群 包容性 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王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中国古代国家与民族的形成，始终是多元人群交融互动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百年来的考古工作，实证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西周作为“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范式”^① 的王朝，对于研究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多元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王畿是王朝的核心政治区域，其大致以周原、丰镐、雒邑三个都城为核心，涵盖都城附近区域中的贵族采邑、土田以及一般居民点等不同等级聚落，是周天子直接管辖的西周中心政治区域。西周王畿边缘位于关中盆地、洛阳盆地周

① 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115页。

邻的西周封国圈与“阪尹”所辖聚落圈之间。^① 考古发现表明,这里汇聚了多元文化因素,是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关于西周王畿中的多元文化因素与多元人群结构,朱凤瀚^②、雷兴山^③、马赛^④、张礼艳^⑤、王洋^⑥等学者都有所探讨。综合青铜器铭文、墓葬形制、葬俗特征与随葬器物等分析,西周王畿并非单一族群聚居区,而是周、商、戎、夷等多元人群交错共处、文化因素交融并存的动态空间。从整体上看,该区域具有出土器物多元、葬俗多样、人群复杂的特点。通过对物质遗存进行文化因素分析,识别可能存在的不同人群群体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常用做法。当前,随着大量考古材料的涌现,以“考古写史”为抓手,分析考古所见的多种文化因素、探寻人群归属,成为观察西周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所谓“考古写史”,即以考古发现与考古学文化为构建古史叙述的基本史料和主体框架,传统文献记载围绕考古学的古史建构体系,用于解读考古发现,补充考古学之不足。^⑦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西周王畿范围内考古所见的多元文化因素,剖析其彰显的多元人群互动交融情景,分析周人整合吸纳多元人群的进程,从而展现中国早期王朝国家多元人群关系演进的历史脉络。

-
- ① 参见王—凡:《西周王畿区域范围的考古学观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② 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 ③ 参见雷兴山、蔡宁:《周原遗址黄堆墓地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2—143页;雷兴山、王洋:《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新理解》,王文超、何弩主编:《学而述而里仁——李伯谦先生从事教学考古60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22年,第206—217页;雷兴山、王洋、种建荣:《西周殷遗民族属判断标准简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三):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359—368页;蔡宁、种建荣、雷兴山:《周原齐家制块作坊居葬关系与社会结构再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蔡宁、种建荣、雷兴山:《陝西周原云塘制骨作坊“居葬合一”论》,《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
- ④ 参见马赛:《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人群构成情况研究——以墓葬材料为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8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38—162页。
- ⑤ 参见张礼艳、燕妮:《西周都邑人群构成的比较分析——从墓葬材料考察》,《东北史地》2015年第6期。
- ⑥ 参见王洋:《华县东阳西周墓地结构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2期。
- ⑦ 参见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一、周人包容特性与多元文化因素判别

西周王畿之所以能够成为多元人群互动交融的重要舞台，“小邦周”之所以能够取代“大邑商”，其根本原因在于周相较商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特质。这一特质在先周时期便已萌芽。

（一）多元人群融合趋势的萌芽

在有关周人初生的文献中，《诗经·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是将周人始祖与姜姓女性祖先联系在一起。相关考古研究则认为，使用高领袋足鬲的刘家文化人群与使用联裆鬲的郑家坡文化人群，共同构成了先周群体。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均指向了周人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多元人群特征，其怀柔兼容的特性在这一时期已孕育而生。

周人从关中盆地迁徙至陕北高原时，开始与戎狄族群进一步融合。《国语·周语》云，“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记载：“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①周人自不窋时期便迁入戎狄的活动区域，至公刘居豳时，复兴后稷的农耕事业，吸引周边百姓纷纷归附。诸多戎狄族群因周人先进的农耕技术而主动融入，从贵族阶层到从事农业生产的基层百姓，共同构建了一个以农耕为纽带的联盟式共同体，为周人日后整合多元族群奠定了基础。

商周之际，周人大量吸纳西土邦国加入联盟，形成翦商联军，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友邦冢君”。《尚书·牧誓》载：“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牧誓八国”的记载证实，周人在灭商时团结的大量周边族群成为其同盟力量。一部分非周族群在王畿内与周人共处；还有的在王朝内为官，具有较高的地位。此时，周人与其他多元人群以军事同盟的方式加深了联系。

这一时期，商人贵族也有西奔归周的情况。《史记·殷本纪》云：“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②《史记·周本纪》云：“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

^① 《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2页。

^② 《史记》卷3《殷本纪》，第108页。

周。”^①可见，商王朝的太师、少师等高等级贵族纷纷投奔周王朝。出土于周原的甲骨文也证实了这一情形。周原甲骨 H31：2 载：“唯殷箕子来降，其执罍厥史，在旃尔卜曰：南宫郃其酢。”该片甲骨记录了商人贵族箕子前来投奔周人。^②这批商人高等级贵族群体，应使用了带有商文化因素的器物。他们在效力于周王朝的同时，逐渐融入这一新生的政治体。

回顾西周建立前的周人早期历史，在周人初生、“窜于戎狄之间”到商周之际的变革中，他们通过政治联盟、军事同盟、迁徙吸纳等途径，在持续的族群互动中不断融合多元人群，自身文化结构日趋复杂。非周的多元人群则通过联姻、共居、同盟、参与军事和政治活动的方式与周人深度交融。在考古学上，识别这些复杂人群，主要通过对包含多元文化因素的遗迹、遗物进行判别。不同族群在长期共处中不仅保持了各自的文化特质，更在互动交融中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多元文化因素的判别

考古发现显示，西周王畿内可识别的文化因素主要有周、商、戎狄、巴蜀、夷越等，囊括区域甚至超出了当时西周的统治范围，彰显了王畿作为政治中心的强大吸引力与文化包容性。周人本土文化作为王畿的主体文化，奠定了西周文明的根基；大量商遗民被迁徙至王畿内并广泛分布；戎狄文化随着戎狄族群与周人的交往、迁徙，逐步传入王畿西部及北部区域；巴蜀文化则通过秦岭通道，以军事同盟、族群迁徙等方式进入关中腹地；夷越文化则随着“周道”网络，^③逐步向王畿地区传播。这些多元文化因素在王畿内汇聚、碰撞、融合、演进，打破了原有族群文化的地域界限，逐步形成兼具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西周政治格局。

周文化因素的特征最为鲜明且具有稳定性，随葬陶器为一鬲或一鬲一罐，这种鬲罐组合区别于商人习俗，成为周文化因素的典型代表。部分随葬铜器上铭文显示作器者为周人，这是作为统治阶层的周人标识自身身份和属性的关键证据。随葬兵器中，常见“毁兵”葬俗，以铜戈居多。在墓道、墓室和附葬车马（车）坑中，还存在拆车葬等葬俗特征。

商文化因素的特征有 11 条判断标准，雷兴山等进行了详细归纳：使用日名，使用族徽，墓葬设腰坑，墓内用牲，墓内殉人，车马坑中马与车的放置位置为驾乘状，墓葬随葬陶簋、盆（孟）、豆等器类，墓葬随葬陶器呈现“同形”现象，墓葬分布呈

① 《史记》卷 4《周本纪》，第 121 页。

② 参见曹玮编著：《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年，第 137 页；田昌五：《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关系》，《文物》1989 年第 10 期。

③ 参见刘逸鑫：《西周成周以东“周道”线路研究》，《考古》2024 年第 10 期。

现“丁字形墓位形态”，存在“居葬合一”的居葬形态，使用骨筭。^①

戎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随葬器物、葬俗特征、墓葬形制与工艺技术等方面。随葬器物方面，常见带流陶罐、单耳罐、有銎铜器、权杖首、铜鍪、青铜轮牙、蚌雕人头像及玛瑙珠饰等，这些器物的文化源头可追溯至甘青地区、北方草原乃至中亚地区。带流陶罐、单耳罐是甘青地区戎狄族群日常生活的典型陶器；有銎铜器、权杖首是戎狄贵族权力的象征，权杖首多雕刻动物纹饰，体现了草原文化的审美特质；铜鍪是戎狄族群的重要炊器。葬俗特征方面，突出表现为“头蹄殉牲”或头部随葬卵石，即在下葬时，将牲畜的头、蹄殉埋于墓内，或是在头部随葬卵石，用于祭祀，这类习俗在甘青地区的戎狄族群墓葬中多有发现。墓葬形制方面，部分戎狄族群墓葬采用偏洞室结构，即从墓道一侧开凿侧洞作为墓室，这种墓葬结构区别于中原地区的竖穴土坑墓，是戎狄族群的常见墓葬形制。工艺技术方面，青铜轮牙、护甲采用非中原传统制作工艺，体现了草原和中亚地区的金属工艺技术。^②

巴蜀文化因素在西周王畿内大多呈点状分布，仅在宝鸡清姜河流域聚集，但其特征鲜明，主要体现在随葬器物上：常见人面纹柳叶形铜短剑，具有巴蜀文化风格的铜长筒罐、尖底罐等。^③ 其中，人面纹柳叶形铜短剑是巴蜀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剑身细长、呈柳叶状，剑格上大多饰有人面纹饰，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周原、丰镐、雒邑等遗址中均有少量出土。这类器物在同时期的巴蜀及周边区域遗址中较为常见，印证了巴蜀文化与王畿地区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

此外，还可通过一些随葬陶器的风格识别夷越文化因素。例如，素面鬲是东夷族群常见陶器，形制与周人所用鬲有所差异，器物素面无纹饰，主要流行于山东地区的东夷族群，西周王畿部分墓葬出土的素面鬲，被认为是东夷文化因素传入王畿的实物证据。西周王畿出土带有拍印云雷纹、曲折纹的硬陶与原始瓷，印证了百越地区与王畿之间存在手工业技术传播或贸易往来。

除了考古材料外，文献史料也为研究西周王畿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参照。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既体现了周人对广阔统治区域内地理和人群的认知，也为我们界定

① 参见雷兴山、王洋、种建荣：《西周殷遗民族属判断标准简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三）：北京大学考古百年考古专业七十年论文集》，第359—368页。

② 参见徐良高：《西周时期周文化区所见西北戎狄文化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24年第1期。

③ 参见宋治民：《试论蜀文化和巴文化》，《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

西周王畿范围、探查王畿内多元族群的分布，提供了文献依据。

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基本辨析考古所见各类遗迹、遗物的归属。不过，考古遗存中被识别出的文化因素，虽然反映了特定人群的文化特质，但对于文化因素的主动选择、适应性改造或模仿，受人群流动、技术传播、贸易交换等多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地将某类器物与某一族群直接对应。基于此，我们无须将每一件遗物或每一处遗迹与特定人群一一对应，而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考察西周时期“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趋势上。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戎不在周之外而在内”，^①王玉哲提出“古代的所谓戎狄，都住在中原，是一种华戎杂处的局面”。^②西周多元人群交流互动的局面，始于“小邦周”取代“大邑商”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先前商人将大批被征服人群迁往殷墟，作为人牲用于祭祀的现象发生改变。周人团结四方诸侯、族群，多元人群互动交流形成“多邦”臣服于“周邦”的政治局面。西周王朝建立后，多元人群的交融关系愈发密切。

西周建立后广泛推行分封制、异姓联姻制等制度，促使周、商、戎狄、巴蜀、夷越等不同族群突破原有的地域界限，形成了交错杂居的社会图景，为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共生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西周时期“华”“夷”之间并非隔绝对立，诸多非周族群与周结盟，成为“友邦冢君”，周王朝与戎狄、巴蜀等周边族群的往来互动贯穿其兴衰全过程。尤为关键的是，中原华夏族群的凝聚并非单向同化过程，而是在多元人群汇聚中相互借鉴的结果，不同人群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逐步融入“华夷一体”的格局，构建了先秦时期的“空前之世局”。

二、西周王畿多元文化因素共存的态势

在周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包容性内化为其政治智慧的核心特质。西周王畿内，从宏观区域层面，中观聚落层面到微观遗迹、遗物层面，均体现着多元文化因素共存、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态势。本文依次从宏观区域，中观聚落，微观遗迹、遗物三个层面考察这一历史图景。

（一）宏观区域所见多元人群的交融图景

在宏观区域层面，以西周都城为核心的广阔区域内，多元人群聚居的聚落错落分布。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8页。

② 王玉哲：《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95页。

西周的“姬姜同盟”政治格局，可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互证基本推定的周公、太公家族采邑得以清晰呈现。岐山周公庙遗址总面积约370万平方米，内含大型墓葬群，其中，陵坡墓地被认为是周公家族墓地。遗址内还发现大型夯土基址、铸铜作坊和制陶作坊等遗存，功能区划基本完整。^① 周公庙不仅规模宏大，更通过礼制性墓葬与手工业遗存，体现了姬姓周人的政治地位，构成周王室核心宗族的统治中心。岐山孔头沟遗址规模与周公庙遗址相当，功能区划完备，包含墓地、作坊与居址等遗存。其中，宋家墓地发现了带墓道的中字形、甲字形高等级大墓，^② 根据墓中出土的“尚爵”铭文，可推定孔头沟遗址是姜太公家族的采邑，^③ 属于姜姓人群的聚落。这两处大型聚落邻近周原，可见其政治地位极为重要，反映了周人通过分封制和联姻制，将姻亲族群纳入政治系统，“姬姜同盟”是周人“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底色。

“友邦冢君”在西周王畿内拥有自己的领地，与周王室共生共融。矢人是周人的一支重要同盟力量，来自甘青地区，一般被认为是戎狄族群。关中西部陇县及汧渭之会一带是矢人在王畿内的聚居地，陇县南坡^④、陇县店子村^⑤等地发现的西周早中期墓葬中，出土了带有“矢仲”“矢”字铭文的铜戈、铜泡等器物；在宝鸡贾村，出土了西周晚期的矢王簋盖。^⑥ 与“矢人”有关的带有“矢”字铭文的铜器在宝鸡戴家湾、宝鸡纸坊头、青化丁童等王畿内其他区域的聚落中也有发现。在今宝鸡市西部，渭河南岸、清姜河谷一线分布着与“獠”相关的遗存，如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⑦ 三处墓地中出土的柳叶形短剑、铜尖底罐、铜平底罐、陶尖底罐、陶平底罐体现出巴蜀文化因素，该区域的主体人群可能与巴蜀人群存在紧密联系，这一文化特征或与“牧誓八国”中的“蜀”有所关联。旬邑西头遗址位于关中盆地北部、黄土高原南缘，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王畿北部边地人群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与融合性，该遗址显示出周文化、商文化、本地土著文化、戎狄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 ① 参见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年第8期；种建荣：《周公庙遗址陵坡墓地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7期。
- ② 参见种建荣、张敏、雷兴山：《岐山孔头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性质初探》，《文博》2007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岐山孔头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 ③ 参见辛怡华：《岐山孔头沟遗址族属及相关问题》，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编：《西部考古》第1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8—98页。
- ④ 参见卢连成、尹盛平：《古矢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
- ⑤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中铁路考古队：《陕西陇县店子村四座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 ⑥ 参见卢连成、尹盛平：《古矢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
- ⑦ 参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獠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的交融特征。^① 因伐商有功被改封到西周王畿的西土古族，在考古发现上也找到了相关线索，^② 华县东阳墓地发掘近百座西周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偏早延续到西周晚期，墓地中有人殉、人牲和火葬现象，反映了该墓地主体人群构成的复杂性，这些西土族群应是团结在周人周围的“友邦”，他们与周人、商遗民在广阔的王畿之地杂居、交融。

此外，商遗民聚落同样是西周王畿多元人群共生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泾阳高家堡遗址的墓葬中随葬完整的青铜礼器组合，铭文多与“戈”族有关；考古调查发现该遗址周围有商周时期居址遗存，表明此处应是商周之际商人贵族戈族的聚落。^③ 长安贾里村遗址邻近周都丰镐，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发掘者认为这不是单一的家族墓地，有的墓葬带腰坑，应是商文化移民及其后代的迁入地。^④ 商遗民从起初的“迁居”到逐渐“融入”并生息繁衍，还深度参与周王朝的政治运行，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调适中，成为维系西周王畿稳定的重要力量。

在甘青地区陇山山脉两翼，周人也与其“西土盟友”混处而居。从出土铜器铭文信息看，甘肃灵台一带或是古密国；泾川县境内的遗址应与阮国、共国存在联系；崇信县于家湾遗址可能与西周早、中期芮国有关。^⑤ 合水县何家畔西周墓葬出土的铜鼎上有铭文提及“伯硕父”“申姜”，“申姜”应为伯硕父之妻，娶自姜姓申国；遗址附近还发现面积较大的西周遗存，可能是西申所在地。从传世文献看，《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邠、鬲、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⑥ 整理者指出，西方“九国”即简文“九邦”。^⑦ 这表明周人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团结吸纳了相当数量的非周人群。甘青地区的体质人类学证据也表明，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向南扩展，并与“古西北类型”“古中原类型”人群交错分布。^⑧ 多元人群与周人关系密切、相伴而居，成为周人的同盟。

- ① 参见刘威：《西周王畿北部边地人群和社会的复杂性与融合性——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上庙墓地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 ② 参见王洋：《华县东阳西周墓地结构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2期。
- ③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高家堡戈国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
- ④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贾里村西周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 ⑤ 参见梁云：《陇山东侧商周方国考略》，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编：《西部考古》第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117页。
- ⑥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287页。
- ⑦ 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85页。
- ⑧ 参见杨诗雨：《体质人类学视角下甘青地区先秦时期人群变迁》，《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由此可见，西周王畿分布着分别以周、商、戎狄、巴蜀等多元人群为主体的聚落。周人在与多元人群杂处而居的同时，还与甘青地区建立紧密联系，西周王畿区域展现出多元人群交融共生的情景。

（二）中观聚落所见多元人群的共居形态

周原、丰镐、雒邑是西周王朝的三大都城，三地聚落等级高、遗存众多、出土遗物丰富，文化因素复杂，人群构成多元。作为西周时期人群共生融合的重要聚落，天下四方辐辏于此，加速了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过程。因此，这里是观察中观聚落层面文化因素的典型代表。

周原遗址中，除周文化、商文化等文化因素之外，还可识别出戎狄、巴蜀、夷越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周文化因素在该区域占主体地位，以黄堆墓地、姚家墓地等成片分布的周人墓地为代表。单个墓葬也大多带有周文化特征。如西周早期的80王家嘴M2^①、齐家制玦M28^②等随葬陶器为单罐，周原ⅡD2M1^③随葬陶器为一鬲一罐，具有周文化因素。西周中期带墓道大墓如姚家M7、M8^④，出现拆车葬、毁兵葬等葬俗，随葬品虽种类颇多，但不见商文化因素的陶簋，应是周人贵族墓葬。黄堆M69^⑤随葬陶器为一鬲一罐，也有周人的拆车葬传统。西周晚期的黄堆M1^⑥随葬陶器为一鬲一罐，墓中还可见拆车葬、毁兵葬等葬俗。姚家M38^⑦随葬陶器为单鬲，还有毁兵葬戈1件，为周人传统葬俗。商文化因素次之，典型遗存如西周早期已出现的庄李铸铜作坊区、齐家北制玦作坊区，呈现“居葬合一”^⑧的形态，据此可判定为商遗民遗存。单个墓葬中也有多处商文化特

① 参见巨万仓：《陕西岐山王家嘴、衙里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第5期。

②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周原考古队编著：《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22—524页。

③ 参见周原考古队：《2001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83—485页。

④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著：《周原遗址东部边缘——2012年度田野考古报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1—85页。

⑤ 参见周原博物馆：《1996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2005年第4期。

⑥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黄堆西周墓地钻探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⑦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著：《周原遗址东部边缘——2012年度田野考古报告》，第228—234页。

⑧ 参见蔡宁、种建荣、雷兴山：《周原齐家制玦作坊居葬关系与社会结构再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征。如西周早期的云塘 M20^① 墓底有腰坑，随葬铜簋上有“父乙”日名，铜爵上有“祖丁”日名；齐家 M8^② 墓底有腰坑，随葬铜爵下有“父丁”日名，觚圈足内有“父己”日名；周原Ⅳ A1M17 墓底有腰坑，上述墓葬体现了商文化因素中墓底有腰坑、使用日名的特点。西周中期的周原Ⅰ A1M6^③、齐家制玦 M26、礼村 M3^④ 墓底有腰坑，随葬品中有多件陶簋等，呈现出商文化因素的特征。西周晚期的周原Ⅰ A1M9、周原Ⅳ A1M25^⑤、齐家制玦 M19^⑥ 墓底有腰坑，随葬陶器多见陶簋和偶数同型现象，亦体现出商文化因素的影响。遗址中还发现戎狄文化因素，最具代表性的是先周时期周原刘家的偏洞室墓。^⑦ 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的召陈建筑群^⑧ 中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受到来自西北方更远区域人群的影响。巴蜀文化因素的典型代表是西周早期的齐镇东北土壕墓，^⑨ 出土了人面纹短剑 1 件。夷越文化因素的代表如凤雏建筑群、云塘—齐镇建筑群中出土的原始瓷，是东南地区手工业技术产品影响的结果。

丰镐遗址中，可识别出周文化、商文化、戎狄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周文化因素占主体地位，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如张家坡西周墓地虽等级不一，且文化因素多元，但其是以四座带墓道井叔大墓 M157、M152、M170、M168 为核心的井叔家族墓地，其墓主属于周人群体。在该墓地中，有西周早期墓葬 M6、M8、M9、M38 等，西周中期墓葬 M4、M29、M30 等和西周晚期墓葬 M41、M67、M88

-
- ①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墓》，《文物》1980 年第 4 期。
- ② 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63 年第 12 期。
- ③ 参见周原考古队：《1999 年度周原遗址Ⅰ A1 区及Ⅳ A1 区发掘简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2 卷，第 512—521 页。
- ④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周原考古队编著：《周原——2002 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 518—520、660—663 页。
- ⑤ 参见周原考古队：《1999 年度周原遗址Ⅰ A1 区及Ⅳ A1 区发掘简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2 卷，第 526—536 页。
- ⑥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周原考古队编著：《周原——2002 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 506—512 页。
- ⑦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7 期。
- ⑧ 参见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 年第 1 期。
- ⑨ 参见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

等，^① 葬俗与随葬品大多具有周文化因素，即墓底均不见腰坑，多数随葬陶器为单鬲、单罐或一鬲一罐等。商文化因素次之，典型墓葬如西周早期的客省庄 M132、M145^②、张家坡 M166 等，墓底有腰坑，随葬陶器中常见陶簋。西周中期的张家坡 M376、M384，西周晚期的马王车站 M13、M15^③ 等，也为墓底有腰坑、随葬陶器常见陶簋，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张礼艳曾对丰镐地区发掘的 1000 多座西周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将该地区的西周墓葬分为十个墓区，认为沔西 C 区代表殷遗民墓。^④ 在丰镐都城內，存在周人和商人等多元人群分片埋葬的墓区。戎狄文化因素的代表是张家坡墓地的 21 座偏洞室墓，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巴蜀文化因素则以西周早期的张家坡 M206 为典型，随葬器物有柳叶形短剑等。

雒邑遗址中，可识别出周文化、商文化、戎狄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周文化因素占主体地位，北窑西周墓地有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的大量周人墓葬，如西周早期的北窑 M446、M451、M17 等；西周中期的北窑 M250、M359、M712 等；西周晚期的 M298、M534、M535 等。^⑤ 这些墓葬墓底均不见腰坑，随葬品常见鬲罐组合或单鬲、单罐，青铜兵器。商文化因素次之，在今洛阳市瀍河以东区域内，存在大片商遗民墓，如洛阳东郊、摆驾路口、中窑村、下窑村等，应是商遗民集中埋葬的区域。如西周早期的摆驾路口 M2、下窑村西 M167^⑥、唐城花园 C3M417^⑦ 等，这些墓葬墓底带腰坑，部分墓葬出土铜器上有日名或族徽，如唐城花园 C3M417 出土铜鼎上有铭文“单作父辛宝尊彝”，鬲上有铭文“覃祖辛”，觚上有铭文“交父辛”等，具有显著的商文化因素。西周中期的唐城花园 C3M433^⑧、唐

-
- ① 1983—1986 年发掘的张家坡西周墓地所举墓例，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 ② 1955—1957 年客省庄、张家坡墓葬所举墓例，均出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沔西发掘报告：1955—1957 年陕西长安县沔西乡考古发掘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年）。
-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镐队：《1992 年沔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 年第 11 期。
- ④ 参见张礼艳：《从墓葬材料看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人群构成》，《华夏考古》2015 年第 2 期。
- ⑤ 洛阳北窑西周墓地所举墓例均出自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的《洛阳北窑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 ⑥ 参见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 9 册，1955 年。
- ⑦ 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唐城花园 C3M417 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7 期。
- ⑧ 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唐城花园 C3M433 西周墓发掘简报》，《文博》2022 年第 4 期。

城花园 C3M451^①、西周晚期的洛阳中州路 M40^②、白马寺东荣校 M4^③、盛世唐庄 C1M8633^④等，基底也都存在腰坑。来自戎狄的文化因素，具有代表性的如西周早期的北窑 M210、西周中期的五女冢 HM359^⑤，均随葬釜戈，其文化源头应是北方草原地区；西周早期的北窑 M32，随葬金片、镀金铜管等，金片是北方游牧人群偏爱的物品。西周早期的北窑 M125 随葬的柳叶形短剑，则带有巴蜀文化因素。

由考古资料所见，西周王畿内的聚落，存在周、商、戎狄、巴蜀、夷越等多元人群交错共居的现象。同时，周人根据统治需要，将多元人群分置王畿各处。以周原、丰镐、雒邑三个都城聚落为核心的地理单元为例，多元人群分布各具特点。以周原为核心的地理单元，大多是周人贵族，商遗民贵族与其他异姓、异族贵族群体，他们久居周原，体现出周人旧都维系宗法的功能。以丰镐为核心的地理单元，呈现出多元人群汇聚的景象，统治者将周人、商遗民与其他多元人群安置于此，经营这一新的行政性都城，体现了包罗万象的王都气象。以雒邑为核心的地理单元，居住了大量有军功的贵族以及商遗民群体，这与雒邑监抚安置商遗民、统辖东方的定位相符合。

要之，以都城为代表的聚落，承载着多元文化因素与多元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聚落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传递环节，更是文化、人群交融的枢纽，汇聚了来自周、商、戎狄、巴蜀、夷越等不同人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互动、通婚与共生，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交流与融合。

（三）微观遗迹、遗物所见文化因素的复杂多样

西周王畿的宏观和中观层面，勾勒了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轮廓，而微观遗迹、遗物层面的考古发现，生动显现了王畿内多元文化因素在个体层面的深度交融。

周文化与商文化因素的交融，体现在随葬器物、葬俗特征、墓葬形制和文化习俗上。如西周早期周原贺家 M5^⑥，随葬铜鼎上有铭文“羊庚兹作其文考叔宝尊彝”，铜簋上有铭文“卫作父庚宝尊彝”，铜器上有“父庚”等日名，这是商文化传

① 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洛阳市瀍河区 C3M451 西周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22 年第 4 期。

②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

③ 参见张剑、蔡运章：《洛阳白马寺三座西周晚期墓》，《文物》1998 年第 10 期。

④ 参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涧河东岸西周晚期墓》，《文物》2007 年第 9 期。

⑤ 参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五女冢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9 期。

⑥ 参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 年第 1 期。

统，但墓中出现毁兵葬这一周人葬俗。西周中期的周原刘家M1^①，墓底腰坑是商文化因素，但墓中随葬单件陶鬲、车马器若干，采用拆车葬，带有鲜明的周文化因素。西周晚期的周原黄堆M3^②，墓底有腰坑是商文化因素，但随葬单件陶鬲、毁兵葬，采用拆车葬，具有周文化因素。更值得关注的是洛阳北窑M347，随葬铜尊上有铭文“叔造作召公宗宝尊彝，父乙”，召公家族在为祖先作器时，也使用了“父乙”这一日名。这表明，商人的某些观念和习俗被借鉴、吸纳，形成了复杂的文化面貌。

周文化与周边族群文化的交融，则展现出更为广泛的开放性。具有巴蜀文化因素的柳叶形青铜短剑，频繁出现在周人贵族墓葬中。如西周早期的洛阳北窑M215，随葬铜剑上有铭文“丰伯”，表明器主应是周人贵族，该剑为柳叶形，带有巴蜀文化因素。西周中期的丰镐张家坡M152为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随葬铜鼎上有铭文“井”，墓主应是一代井叔、周人贵族，墓中也随葬具有巴蜀文化因素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西周中期的孔头沟宋家M16，随葬铜鼎上有铭文“井伯”，铜戈为毁兵葬，为周文化因素，随葬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则体现出巴蜀文化因素。

戎狄文化因素，如有銎戈、头部随葬卵石以及具有甘青地区风格的带流陶罐，也见于周原、丰镐等地墓葬之中。如西周早期的周原贺家M1^③，随葬铜器组合为周人常用的鼎簋组合，墓中出土有銎戈，体现出与戎狄文化因素的交融特征。西周中期的丰镐大原村M11^④，墓底设腰坑，具有商文化因素；头部随葬卵石则带有戎狄文化因素，体现出二者的文化互动。

多元文化因素的融合，并不限于两种文化之间，周文化、商文化和戎狄文化因素交融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宝鸡石鼓山墓地被认为是宝鸡地区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的墓地。^⑤其中石鼓山M1，随葬铜鼎、铜尊上有铭文“亚共庚父丁”，为日名，铜甲则为锻打式，是戎狄乃至中亚地区的技术传统，石鼓山M3中除日名铜器、有銎兵器外，还出土周人常用的高领袋足鬲，整个墓地体现出周文化、商文

- ① 参见陕西省文物志编纂委员会、扶风县文物志编纂委员会、周原博物馆：《扶风县文物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 ②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黄堆西周墓地钻探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 ③ 参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 ④ 参见付仲杨、徐良高：《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西周墓葬所见人群构成及文化融合现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⑤ 参见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

化和戎狄文化因素的相互交融。西周中期的丰镐大原村 M10^①，同样体现了三种文化因素的融合，其基底有腰坑，随葬具有戎狄风格的带流陶罐 1 件，出土采用毁兵葬的铜戈，墓葬填土中还有头蹄殉葬现象，是个体吸收、融合多元文化因素的集中体现。

凡此，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观之，均“怀柔兼容”地接纳了来自各方的多元人群，体现出以周、商为主体，杂居戎狄、巴蜀、夷越等多元人群的交融共生与文化汇融。

三、西周王畿“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西周王畿作为王朝政治核心区域，呈现出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明面貌，展现了超越地域和族群的包容性。周人系统规划并构建了以王畿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政治格局。

（一）多元人群交融的历史进程

多元人群交融的历史进程，自先周时期初步互动萌芽，历经商周之际战争的强力整合，再到西周早期分封制下的迁徙共处，直至西周晚期的深度交融，这一历程贯穿西周王朝兴衰。

西周王朝建立后，多元人群开始大规模融合。无论是新臣服的商人，还是先周时期就已归附的西土族群，都被纳入周人的政治实践中。在分封制的大背景下，周人用行政手段大量迁徙不同人群，安置在王畿内。在营建雒邑的大型工程中，周人征用了大量商遗民群体。《尚书·召诰》载：“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在周人的管理下，商遗民广泛参与到新都雒邑的建设中。

戎狄和巴蜀族群是较早融入周人的部族，西周时期其依然在政治上拥有较高地位。丰镐张家坡西周墓地代表了王畿内的井氏一族，而宝鸡茹家庄 M2^② 井姬墓出土的铜鼎、甗上分别有铭文“虢伯作井姬用鼎”“虢伯作井姬用甗”等，表明西周初年周人与巴蜀人群存在联姻；而虢伯也因此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居于王畿西部的重要关隘。西周中期的张家坡 M183 为偏洞室墓，墓主应是戎狄人群，根据墓中出土的伯唐父鼎可知，墓主为伯唐父，伯唐父可直接向周王报告，并能与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陕西西咸新区大原村西南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20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虢国墓地》，第 363—374 页。

周王泛舟，接受周王的赏赐，可见其虽非周人，但政治地位较高。

西周晚期，周人与多元人群的交融程度进一步加深，许多西周早、中期可鲜明识别出的非周族群的文化因素此时已较为少见，如墓底腰坑殉狗的商文化因素已鲜有出现，一些戎狄文化因素也内化为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铜器铭文中仍可见商遗民贵族在周人政治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趺簋（《集成》^① 04317）铭文记载：“肆余以饌士、猷民，禹整先王宗室。”这是说周厉王启用的社会贤达也包括归附于周的商人世家大族。

从先周晚期对戎狄文化因素与戎狄人群的吸纳到商周之际“牧誓八国”的军事、政治整合，周人成功将周边族群纳入反商阵营，形成跨越族群的政治共同体；再到西周时期的多元文化因素渐进式交融，周人更是以分封、异姓联姻、官职任用等制度，逐步系统地构建起周、商、戎狄、巴蜀、夷越等多元人群在王畿的共生态势。西周时期，族群融合不断深化，多元人群从军事同盟走向文化认同，并最终形成了西周王畿“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

先周乃至西周时期，除了周人自身包容性这一内在因素外，商周之际的天下剧变大势亦对多元人群交融互动有重要影响。商灭周兴的政权更迭打破了原有的族群格局，让诸多族群共同处于新的政治疆域之内。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倘若周人不能顺应时代大势整合各方力量，本就是“小邦”的新生王朝，便无法妥善管理数量众多的商朝遗民与其他族群，难以构筑稳固的统治根基。基于这一现实需求，周人长期以来孕育出的包容性特质，推动其主动对多元族群进行吸纳与融合。商朝灭亡后，历经三监之乱，周人东征、南征等重大事件，中原政治秩序持续震荡，各族群为寻求生存空间主动开展迁徙与融合。此时，周人面对“夷夏交侵”的局面，摒弃了商人重鬼神的统治方式，采取“德行教化”的治理方略，使多元人群间具备了交融的条件。《逸周书·大聚》载：“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设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德。”^②周王朝将多元人群纳入新的政治系统中以巩固统治。周人的包容特性、商周变革的历史趋势、多元人群为生存发展而主动归附周王室，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多元人群在西周王畿交融共生的历史进程。

（二）“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特征

西周王畿政治格局的稳定，关键在于妥善协调周王、周人统治集团与多元人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文中简称《集成》。

② 黄怀信、张懋镠、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8页。

群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同等级聚落和不同地理单元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西周建立后，统治者实施了一套整体规划。这一规划的核心内容包括：依托山川地势构建聚落布局，并据此对多元人群进行分配、安置和管理。不同等级聚落和不同地理单元，是王畿政治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多元人群在这一系统中各司其职，发挥特定功能。这种安置策略，保障了西周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促进了多元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总体上表现为“以都为聚，四方攸同”“友邦冢君，保我有周”“东南西北，无思不服”三大特征。

从都城层面来看，呈现出“以都为聚，四方攸同”的特点。周原、丰镐、雒邑均存在多元人群，他们共同构成西周政治系统的中枢。在三个都城中，周文化因素占主体，商文化因素次之，来自戎狄、巴蜀、夷越的多元文化因素在此交融。不过，周原、丰镐、雒邑三地在多元人群的接受、吸纳和整合利用方面各有差异。

在周原，周人将来自东方的商遗民贵族和异姓、异族贵族迁居到此。这些贵族群体与周人贵族共同居住在这一区域。周原出土的史墙盘（《集成》10175）铭文云：“青幽高祖，在微灵处，雒武王既伐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这说明微氏家族从西周早期开始便在周王左右，参与西周政治系统的运行。而从考古发现来看，周武王灭商后，一批商人贵族被迁徙到关中地区，并长期在此居住。同时，周原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窖藏及零星铜器，张长寿提出，周原的建筑基址实际上是诸姓贵族聚居地，宅院鳞次栉比。^① 铜器铭文与出土遗物所见多元文化因素，体现出周原多元人群相互交融。

丰镐最初是周人东进的前线都城和经营东方的指挥中心，后来成为西周王朝的行政中心。相较于周原，丰镐能更全面地接受、吸纳与融合多元文化因素。在与东方诸族群展开政治互动、经济往来的过程中，丰镐的包容性、开放性使族群与文化的融合更加便利、有效。

雒邑是西周征商胜利后周人在东方新建的都城，通过对文化因素构成分析可知，西土周人与东方商遗民群体构成雒邑主体居民。刘逸鑫曾提出周初采取了“封建迁殷，离散强宗”的商遗民政策，^② 雒邑地区人群构成体现出周人对不同人群的功能性利用。

西周王畿中，周原、丰镐、雒邑三个都城的多元人群，共同参与西周王朝的政治活动，成为政治系统运行与王朝权力传递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西周王畿的各层级聚落和空间格局上看，呈现出“友邦冢君，保我有周”的

① 参见丁乙：《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

② 参见刘逸鑫：《出土日名青铜器所见周初殷遗政策》，《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态势。在汧河、金陵河河谷地带识别出较多与矢有关的戎狄文化因素；在清姜河与汧渭之会流域则多见与巴蜀有关的文化因素。这说明关中盆地虽属西周王畿，但在其西部还存在非周、非商的族群，他们因与周同盟，部分在王畿内居住，且大多位于王畿边隘，成为王畿的屏障，拱卫核心政治区域。

在泾河以东、渭河以北、黄河以西的北山山系南麓地区则可识别出较多的戎狄文化因素，以淳化黑豆嘴等遗址为典型。这与该区域靠近黄土高原南缘，黄土高原人群与此地的交流互动更加便捷有关。

在西周王畿北部边缘，漆水河以东、泾河以西、渭河以北的北山山系南麓地区，泾河以东、渭河以北、黄河以西的北山山系南麓地区，黄河以北、沁河以西、太行山以南地区等，聚落大多以周人为主，辅以商遗民与多元人群的聚落，共同构成了王畿北部边缘地区的防御体系。这一聚落格局的形成，可能与北方人群同西周王朝的紧迫局势有关。

西周王畿多元人群在交往交流的同时，彼此之间深度交融。多元人群通过缔结姻亲关系，突破族群限制，结成紧密的政治同盟。西周历代王后多来自姜、妘、妘等族群，直接印证了周王室与非周族群通过联姻实现族群交融。考古发现亦可佐证这一现象：一些贵族男性墓葬旁往往有其他族群的女性墓葬，身份应为其妻，如宝鸡茹家庄墓地，姬姓井氏女子与彊伯结为夫妻，死后同葬，体现了贵族阶层中周人与巴蜀人群的交流共生等。

多元人群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广泛融入西周政治系统运行。史墙盘铭文记载了商人贵族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乙公及作器者史墙六代人皆效力于周王朝。在军事活动中，大量多元人群凭借军功获得政治地位，居住于王畿内。如随周人伐商的“牧誓八国”“友邦冢君”，华县东阳墓地所揭示的西土古族，王畿西部分布的矢人等戎狄族群。

多元人群融入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承担各自职能。丰镐大原村制陶作坊的发掘资料显示，不同族群、不同等级的人群，聚集在同一片作坊共同进行陶器生产。关于周原手工业园区的研究也表明，西周时期周原遗址聚落内的作坊或功能区，已突破简单的血缘组织，形成地缘组织单位，不同族群可能共同从事生产活动，^① 这充分彰显了西周王畿地区不同族群相互交融的情景。

综上所述，西周王畿多元人群的整体构成呈现出“东南西北，无思不服”的气魄。正如《诗经·文王有声》载：“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筑城伊湫，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遘迨来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

① 参见郭士嘉、雷兴山、种建荣：《周原遗址西周“手工业园区”初探》，《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都城内的周、商、戎狄、巴蜀、夷越等多元文化因素交汇融合，彰显了周王朝接纳万方的气象。采邑内人群以宗法为纽带，兼之不同来源与背景的人群在此交融，形成西周王畿社会运转的中坚力量。基层聚落内多元人群和谐共生，秉承不同源流习俗的黎庶相伴而居，成为社会文化融合的底色。西周王畿既是周王室向天下四方发布王命的政治中心，也是接纳天下四方的核心区域，沟通上下、汇聚融合，维系着多元人群社会的整体秩序与长久稳定，促进了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结 语

通过对西周王畿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结合不同层级聚落的遗迹单位随葬器物、葬俗特征、墓葬形制等要素，可揭示该时期文化因素呈现出的多元特征与区域差异，并进一步观察其所反映的人群构成特征。由此不仅延伸了周商戎夷，多元一体的历史轴线，更增强了“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的历史信度，丰富了姬姜同盟，友邦冢君的历史内涵，活化了多元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

“周人迁岐时，本身未必是一支很强大的文化，在他的不断壮大过程中，吸收各种新文化因素，才形成后来的周文化。”^① 周文化因素与来自戎狄、巴蜀的多元文化因素，以及新征服的商文化因素交错分布、融合发展，多元人群在西周王畿交往交流交融。这是一种超越简单军事征服与行政管控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与多元人群的整合，是周人政治智慧与国家治理模式的体现。

西周王朝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根源在于周人“怀柔兼容”的包容特性。周人在其发展的关键阶段，无论是从豳迁岐的适应与学习，还是在与商人长期交往甚至对抗中的吸收、借鉴，都显示出周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这一政治实践，将周、商、戎狄、夷越等多元人群纳入西周国家框架和政治秩序之中。周人将文明和天下的边界从族群血缘升级为文化认同，将文化差异转化为共同体凝聚力的努力，使“周”从蕞尔小邦，在怀柔兼容多元文化与多元人群中不断壮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辑：晁天义〕

① 徐良高：《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48页。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ir cultural influence continues to pervade the everyday lives of rural residents.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eryday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help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eag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everyday practices, common property, and lineage conception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lineage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continuous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to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no longer regulate their members' lives through institutions, but rather embody concerns for consanguineous succession and family continuity through cultural symbols. 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eages sustains cultural vitality, it also creates governanc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with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jointly shape rural residents' spiritual world. This is not only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good rural governanc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thway by which rural traditions can underg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verse Populations in the Western Zhou Royal Domain

Wang Yifan • 147 •

The Western Zhou royal domain was not only the core political region of the dynasty but also a vital arena for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verse popula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coexistence and integration among diverse populations was rooted in the Zhou's greater inclusiveness relative to the Shang. This trait permeated the entir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It germinated in the initi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Rong and Di peoples during the pre-Zhou period, underwent forceful consolidation during the conquest of the Shang 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evolved into shared settlement through migration under the enfeoffment system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and culminated in deep integration by the late Western Zhou.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it remained the cor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rise and flourishing of the Zhou people. Observation of the diverse populations within the royal domain show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pital cities, it exhibited the feature of "gathering at the capital, with all quarters united"; in terms of settlements at various hierarchical levels and spatial pattern, it presented a posture of "allied lords and sovereigns safeguarding our Zhou"; and regarding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of the diverse populations, it demonstrated the momentum that "all directions,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submitting without reservation." The Zhou people's trait of "gentle accommodation and inclusiveness" transforme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o powerful political cohesion through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laying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Jingxue* and Historiography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Zhang Kai • 165 •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scholarship

• 206 •